

邻里效应与移民社会融入：以上海为例

陈伟 赵雨婷^①

摘要：居住社区内本地居民和移民的交往互动情况会影响后者的社会融入。基于“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 2017年的住户调查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以社区本地居民集体效能为代表的邻里效应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在未控制移民个人特征时，社区内本地居民集体效能对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本地居民集体效能感越高越不利于移民的上海人身份认同。但是，社区本地居民的集体效能对移民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区本地居民集体效能对具有业主身份的移民和具有上海户口的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本地居民社区集体效能中社会凝聚力部分能够有效促进具有业主身份和上海户籍身份的移民认同自己为上海人，但是本地居民集体效能中非正式控制部分则没有显著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中本地居民的态度和集体意愿将制约着移民的社会融入，以社区本地居民集体效能为代表的邻里效应对移民的社会融入起到总体性排斥和选择性吸纳的作用。

关键词：邻里效应 集体效能 移民 社会融入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租购并举住房制度下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21CSH096)阶段性成果。

①作者简介：

陈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邮箱：chenweiab12@gmail.com。

赵雨婷，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

Neighborhood Effect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Evidence from Shanghai

Wei CHEN Yuting ZHAO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and migrants in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affects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Based o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household data from 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2017), this study estimates the specific impact of neighborhood effects, represented by the collective efficacy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out controlling for migrants' characteristics, the neighborhood effects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the collective efficacy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The higher the collective efficacy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the less favorable it is for migrants t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Shanghainese. However,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collective efficacy on migrants. The collective efficacy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plays a facilitating role in the identity formation of migrants with homeowner status and Shanghai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pecifically, the social cohesion of local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immigrants with homeowner status and Shanghai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s Shanghainese, whereas the informal control aspect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ttitudes and collective will of locals in community constrain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The neighborhood effects, represented by collective efficacy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neighborhood, have both exclusionary and selective absorption effects on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Neighborhood effects; Collective efficacy;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一、研究问题

社区是移民在城市的生活空间，是移民融入城市的关键场域。移民在社区中与本地人交往互动，也竞争着社区的公共资源。从本外地人交往互动来看，如果本地人对移民采取接纳的态势，则可能促进移民融入本社区，进而促进移民融入城市；若本地人对移民采取了排斥性行动，则可能会不利于其融入社区，从而不利于其融入城市社会。从本外地人的资源竞争来看，移民入住社区后可能会使本地人感受到利益威胁，从而引发“土客冲突”（李煜，2017）。在资源竞争的背景下，社区本地人在与移民交往时更容易表现出排斥性，通过排斥外群体的方式来强化内群体的身份地位（刘雨婷，2021），从而不利于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换言之，移民所居住社区中由本地人所构筑的邻里效应可能会影响移民融入城市社会（威迪明等，2016）。

不过，本地人和移民的交往互动可能具有群体选择性，这可能导致邻里效应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既往研究发现，本地移民的排斥或者接纳具有选择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移民可能面临着不同的境遇。本地人对于文化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更相近的移民，可能更具有包容性和接纳性（王桂新、武俊奎，2011）；而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更差，或者文化差异更大的移民，则排斥性更大（李兴华等，2017）。在中国城市中，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制度性地位通常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测量，一个方面是移民是否在城市拥有住房，那些拥有住房的移民在社区中具备了业主身份，在经济地位上更为接近本地人（方长春，2020）；另一个层面是移民是否具备了本地户籍，拥有本地户籍也意味着移民在制度

身份上更为接近本地人（康岚，2017）。

本文试图从社区层次的交往互动视角来探究邻里效应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主要研究问题有：第一，社区的邻里效应是否影响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第二，邻里效应的影响是否会随着移民的业主身份和户籍身份而存在异质性？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城市移民社会融入的四个研究进路

当前国内移民社会融入的相关文献主要有四个研究进路：第一个是宏观结构分析，主要关注社会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制约；第二个是社会互动，主要关注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交往互动；第三个是移民的个体特征，主要分析移民作为行动者在宏观结构制约下的融入行动；第四个是社区层面的特征，主要包括社区类型、社区人口结构、社区环境等特征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前两个研究进路侧重于宏观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而后两个研究进路则侧重微观层次上个体行动与微观互动。

第一，宏观制度方面，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讨论户籍制度等影响移民社会融入的制度性障碍（李强，2003；杨菊华，2015）。改革开放后，市场的力量吸引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聚集，但制度壁垒特别是户籍制度，将移民排斥在城市社会的资源分配之外，阻碍了移民在城市社会的融入（王桂新、武俊奎，2011；潘泽泉、何倩，2017）。随着户籍改革的推进，有一些移民开始获得本地户籍。对于获得本地户籍的移民来说，制度所造成

的限制不再存在，他们可以与本地人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和资源分配。对于没有本地户籍的移民，常被排斥在迁入地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之外，从而影响了其融入城市社会（崔岩，2012；周庆智，2018）。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促进移民在心理上融入城市社会，移民获得迁入城市的户口或居住证之后，能够享受更多的市民权益，从而弥合了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权利差距，能够增进他们的本地身份认同（陈伟等，2023）。

第二，从移民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层面来看，已有文献多关注本外地人在城市内的资源竞争。根据“利益威胁论”假说，人们通常认为本地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中，会将移民视为利益威胁而采取排斥行动（柳建坤、许弘智，2019；李骏等，2021）。城市的公共资源和公共福利总额是一定的，移民的进入实际上形成了与本地人的资源竞争格局。若移民使本地人产生实际的或者可预计的利益损失，那么本地人就会对移民产生排斥心理，进而产生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冲突（李煜，2017；康岚，2015；李煜、康岚，2016）。但也有文献表明，本地人对移民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排斥，保留了接纳、欢迎的部分（王桂新、武俊奎，2011）。

第三，从移民个人因素来看，当前文献主要着眼于移民的人口学因素、家庭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等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影响移民社会融入的人口学因素包括性别差异（张幸福、王晓峰，2019）、代际（王春超、张呈磊，2017）以及家庭团聚程度（杨菊华，2015）等。有学者认为，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移民在城市社会的融入水平越高（李强、何龙斌，2016）。社会资本常作为移民社会融入的重要解释理论，其影响有着两种面向，一方面，以初级群体

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对移民的社会融入产生负向作用，如同乡聚集所产生的居住隔离阻碍了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互动交往，进而不利于移民的社会融入（曾东林等，2021）；另一方面，移民在进入迁入地之后，与本地人之间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其社会融入（赵延东、王奋宇，2002；张文宏、雷开春，2008）。

第四，在社区层次，已有文献分析了社区类型、社区组织、社区人口构成以及社区环境等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社区融入是社会融入的基础，移民的社会融入也具有一定的社区依赖性，良好的社区服务和社区接纳环境能有效提高移民的社会融入水平，较低的社区参与门槛亦能有效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入（杨菊华，2015；刘建娥，2010；刘祖云、彭灵灵，2019）。有研究者关注移民的居住选择，特别是社区层面的居住聚集与居住隔离等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景晓芬，2018；邹静、邓晓军，2021）。研究表明，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社区有利于移民的身份认同，移民与本地人的居住空间距离越近，在心理上更倾向于融入当地社会，越能提高移民的社会融入水平（潘泽泉、何倩，2017；陆万军等，2020）。而居住在以老乡为主的社区或以非本地人为主的社区，则不利于移民的社会融入（曾东林等，2021；刘启超，2022）。

以上文献所涉及到的四个研究进路，涵盖了宏观和微观视角，强调了制度结构与行动者，为人们理解移民的社会融入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积累。但是，这些研究过多关注制度制约或个人境遇，在社区层面仅考虑了基本人口特征或居住选择，对邻里效应缺乏足够的分析。因此，本文从关注社区层面的因素，结合社区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交往互动来分析邻里效应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

（二）邻里效应与移民社会融入

邻里效应 (Neighborhood Effects) 是指居住区特征对居民的态度、行为产生了超越个体的结构性影响, 是不同社会群体在社区地域内产生的空间聚集效应 (威尔逊, 2007:3-28; 罗力群, 2007)。由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嵌入在社区环境中, 这使得居住社区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

综合以往文献, 学者们已探究多种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 比如有社会化机制、社会服务机制、环境机制以及区位机制等 (汪毅, 2013)。桑普森等人从社会联结和规范控制角度提出了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 并从社会失序和社会解组现象出发, 引入了集体效能 (Collective Efficacy) 概念, 意指社区居民的社会凝聚力以及居民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干预的意愿 (Sampson et al., 1997; Sampson et al., 2002; 罗伯特·J. 桑普森, 2018 :128-130)。那些具有高集体效能的社区, 往往能够有效抑制社区内部的犯罪, 提升社区居民的福祉。弗里德里斯等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邻里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 但是共享的社会规范以及对当地公共空间的控制感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机制 (Friedrichs et al, 2003)。概言之, 诸多学者均将“集体效能”作为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

根据桑普森的定义, 集体效能这一概念包含“社会凝聚力” (Social Cohesion and Trust) 和“非正式社会控制”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两个层面。社会凝聚力主要是指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 非正式社会控制则指社区通过所期望的原则来调节其成员以实现集体目标的能力。社会凝聚力侧重于社区内居民的团结程度, 非正式社会控制则着眼于社

区的失序现象 (Sampson et al., 1997; 罗伯特·J. 桑普森, 2018)。社会凝聚力和非正式社会控制密切相关, 具有凝聚力的社区是实现非正式社会控制的条件, 居民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干预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邻里之间相互信任和团结 (Sampson et al, 1997; Jiang et al, 2013)。桑普森及其合作者的众多研究结论表明, 社区的集体效能感越高, 伴随着的是社区的低犯罪率、低新生儿死亡率以及社区较少的贫困等现象, 即高社区集体效能感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社区集中劣势的不良影响 (罗伯特·J. 桑普森, 2018)。

桑普森等人对美国城市社区中集体效能的研究发现, 社区的集体效能具有很强的空间稳定性 (罗伯特·J. 桑普森, 2018)。尽管社区内居民的流动性很强, 但社区的集体效能在规定时间内基本保持一致, 高集体效能的社区依旧维持在高水平, 低集体效能的社区依旧维持在较低水平。社区的集体性效能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

一方面, 在社区中居民不断流动的情况下, 原社区居民所形成的文化氛围、社交网络、集体凝聚力和一定程度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意愿及行为会对进入社区的新移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通过对新移民的不断吸纳和融合, 形成空间上稳定的邻里。移民研究的文献也表明, 移民会通过与当地居民的互动, 形成其社会身份认同 (崔岩, 2012)。因此, 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1a: 居住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越高, 本地人更能吸纳移民融入社区, 从而使移民在城市社会的融入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 社区内原居民为维持社区的稳定性, 对于与自身差距较

大的移民可能产生一种排斥作用，抵抗移民带来的影响，而移民感知到的本地人对其的社会排斥越强，越难以融入迁入地社会（王毅杰、赵晓敏，2020）。有研究文献指出，美国种族隔离的影响始终存在，白人对少数族裔的污名化认知和居民对低集体效能感社区的污名化认知会使邻里结构保持稳定，这种内在的隐性偏见也导致了种族隔离和失序、劣势集中不断强化 (Wacquant, 1993)。在白人为主导的高集体效能社区，由于内在的对黑人和少数族裔的偏见和污名化，认为其会带来一系列诸如暴力、犯罪和身体及心理健康损伤的结果，白人会排斥非白人进入本社区，以规避可预见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为了维持本社区稳定的共同体结构，白人为主、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社区始终存在着对少数族裔的排斥。换言之，社区主要群体的高集体效能对其他少数族裔移民形成了排斥。借鉴以上研究，社区集体效能对移民社会融入作用存在另一种竞争性假设，即：

假设 1b：居住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越高，本地人更倾向于排斥移民，从而不利于移民的社会融入。

上述两个研究假设，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对移民的社会融入所带来的影响，一个可能性是本地人的高集体效能感会增强社区整体凝聚力和吸纳能力，另一个可能性是本地人的高集体效能会强化本地人之间的联系，形成封闭性的群体，从而排斥移民。

（三）邻里效应的群体异质性

以上由集体效能作用机制所推导而来的一对竞争性假设，都将移民视为同质性的群体，认为本地人与移民的吸纳或排斥都是一致的。但实

际上, 移民内部存在着异质性, 已有研究也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和制度身份群体社会融入水平有差异(崔岩, 2012; 陆万军等, 2020)。西方的移民研究发现, 本地人更倾向于排挤低技能劳动水平的移民, 而接纳和欢迎受过良好教育、工作较好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移民(Scheve et al., 2001; Hainmueller & Hopkins, 2015)。国内的研究也发现, 本地人对移民的接纳程度会有所不同, 本地人更容易接纳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与自己一致的移民(褚荣伟等, 2014), 更容易接纳具有本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移民(张文宏、雷开春, 2008), 更容易接纳具有本地户口的移民(康岚, 2015)。同样, 社区邻里效应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也可能存在着群体异质性。

第一, 移民的业主身份存在异质性。有研究发现, 城市社区内业主比例会显著影响社区的邻里关系(蔡禾、张蕴洁, 2017)。以往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表征主要包括教育、职业和收入, 但从 21 世纪以来, 资产已经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地位表征, 其中住房产权就是居民非常重要的资产之一(李骏, 2021)。移民在社区获得住房产权之后, 其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本地人处于相当水平。除此之外, 获得社区的业主身份是行使社区诸多权利的必要条件, 比如业主可以参与社区的选举投票、公共事务讨论等, 而租户则被排斥在大部分社区公共生活之外, 难以享受业主的权利(徐延辉、史敏, 2020)。业主在社区治理等方面有着更多话语权, 因而社区本地人会倾向于团结具有业主身份的移民, 以保障社区业主的共同权益。同时, 在我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下, 住房不仅是一个住所, 更是“家”的重要载体, 这也就意味着, 业主身份会使移民对本社区具有更程度的认可。因此, 可以有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2: 居住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会促进具有社区业主身份的移民融入本地社会。

第二, 户籍制度身份的异质性。户籍制度决定着移民的制度身份, 影响着移民的社会融入(褚荣伟等, 2014)。户籍壁垒是移民和本地人之间非常显著且难以跨越的鸿沟, 缺乏本地户口的移民在进入迁入地社会后难以获得充足的公共服务, 也就难以融入城市社会。那些获得迁入地户口的移民, 在制度层面与本地人具有相同的身份, 并且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杨菊华, 2017; 张开志等, 2020)。因此, 获得迁入地的户口后, 移民能够更大程度地获得本地人更大程度的认可, 也更容易被本地人所接纳。从社区层面来看, 若移民拥有本地户口, 则会影响邻里效应对其社会融入所产生的作用。因此, 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居住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会促进那些已经获得本地户口的移民融入本地社会。

三、研究数据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实证数据来源于“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的住户调查。“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由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社会学Ⅲ类高峰计划资助, 由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负责设计和执行。“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住户调查项目在全上海范围内随机抽取了 180 居村委, 从每个被抽中的居村委中随机抽取 30 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 访问对象包括同住的所有

家庭成员及其非同住少儿(15周岁以下)。住户调查于2017年正式完成,总计成功获得了5102户有效家庭问卷数据、8631位成人(15岁及以上)问卷以及1892份少儿问卷(15周岁以下)(孙秀林等,2018:9-25)。SUNS在成人问卷中设置了“社区模块”和“移民模块”,询问居民在社区的生活情况和社区集体效能等,并在移民模块询问了移民的社会融入情况。本文使用SUNS住户调查的家庭问卷及个人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SUNS将“移民”定义为出生时不是上海户口的居民,“本地人”定义为出生时和当前均为上海户口的居民,本文沿用此定义。这样,SUNS的移民样本包含两类,一类是出生时未拥有上海户口但目前已经是上海户口的移民,一类是出生和现在都不是上海户口的移民,前者是该项调查中较为特殊的部分,目前关于移民的调研数据大多聚焦在流动人口也就是没有获得户口的移民上,但对于后天获得迁入地户口的移民关注较少,其默认将制度上的融入视为了完全融入,但实际上制度融入并不能完全代表移民的社会融入,尤其是心理融入。因此,本文使用SUNS数据可以很好将两部分移民都纳入分析。SUNS数据中符合移民定义的成人样本总计3705人,剔除关键变量中有缺失的样本后,得到分析样本为3353人,分布在177个社区。

(二) 变量操作化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水平,操作化为移民对本地身份认同程度。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测量界定有所不同,但基本都围绕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接纳和

心理认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展开（李培林、田丰，2012；景晓芬，2018）。通常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入应当建立在移民对迁入地社会的高度心理认同上，心理融入才是最高层次的融入（崔岩，2012；夏伦、沈寒蕾，2022）。本文将移民的社会融入操作化为移民的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该变量通过询问被访者“您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吗？”来进行测量，选项为 1-7 分，1 分表示非常不认同，4 分表示一般，7 分表示非常认同，分数越高表示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越高。该操作化具有较高的信度（陈伟等，2023）。

本研究主要的解释变量为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移民的业主身份和户籍身份。

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上海都市社区调查 (SUNS) 借鉴桑普森等人在芝加哥邻里人类发展项目和欧洲调查中的测量方案 (Sampson et al., 1997；罗伯特·J. 桑普森，2018；Sampson & Wikström, 2008)，在住户调查的成人问卷中使用精简版本的题项测量被访者的社区集体效能 (Miao et al, 2019)。在社区凝聚力方面，SUNS 通过询问被访者对两种说法的同意程度进行测量，分别为“住在这里的人们愿意互相帮助”和“我可以信任住在这个社区里的人”，回答的选项为 1 至 5，代表很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在非正式社会控制方面，同样通过两个题目进行测量，询问了被访者如果以下情况发生在目前居住的社区，有多大可能上前阻止，分别是“有孩子在墙上乱涂乱画”和“有孩子在路边打架”，回答选项为 1 至 5，代表非常不可能至非常可能。针对以上四个具体测量，本文使用求均值法进行降维。将被访者在社会凝聚力题项上的 2 个回答求均值，得到个人的社会凝聚力分值，范围为 1-5 分，同样也

计算了非正式社会控制分值。之后将个人的社会凝聚力和非正式社会控制分值求均值处理,即可得到个人的集体效能感分值,取值范围为1-5分。在获得个人的社会凝聚力、非正式社会控制和集体效能感分值后,在社区层面上分别对社区内上海本地人的这三个指标汇总并求均值,得到该社区本地人的社会凝聚力分值、非正式社会控制分值和集体效能分值,分值在1-5分之间,数值越高代表该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越高、社区本地人社会凝聚力越高或社区本地人非正式社会控制水平越高。

业主身份。移民的业主身份通过SUNS的家庭问卷中家庭住房产权情况界定。SUNS的家庭问卷中询问了样本家庭当前住房的产权状况。考虑到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通常同一家庭内成员均拥有该住房的所有权,因此,本文将当前住房产权自有的家庭成员编码为业主身份,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户籍身份。上海都市社区调查询问了被访者出生时户口所在地和现在的户口所在地。本文将当前户籍所在地上海市的移民定义为本地户籍身份移民,将户籍不在上海市的(包括外籍)定义为非本地户籍身份移民。

本研究主要控制了移民人口学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是否就业、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以及社区居住时长。社区居住时长区分为是否在本社区居住超过1年(未满1年编码为1,否则为0)。这是考虑到一般而言移民租房时签署的租赁合同为1年,如果超过1年,邻里效应的作用可能会更强。通过社区居住时长,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移民居住选择性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详细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N=3 353)

	均值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社区本地人				
集体效能感	3.624	0.291	2.833	4.625
社会凝聚力	3.598	0.312	2.803	4.625
非正式社会控制	3.649	0.382	2.556	4.625
移民				
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	3.080	1.967	1	7
业主身份 (是=1)	0.327	0.469	0	1
上海户口 (是=1)	0.210	0.407	0	1
受教育年限	11.515	3.798	6	19
就业 (在职=1)	0.790	0.407	0	1
年龄	40.044	14.098	18	80
性别 (男=1)	0.486	0.500	0	1
婚姻 (在婚=1)	0.796	0.403	0	1
社区居住时长 (不超过 1 年=1)	0.338	0.473	0	1

注：数据来源于上海都市社区调查 (SUNS) 住户调查。

(三) 统计模型

本文的因变量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为连续变量，因此使用普通最小二乘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进行回归分析。在模型中，逐步引入变量间的交互项，以对移民的业主身份和户籍身份在邻里效应和移民社会融入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一) 本地居民社区集体效能感的影响

表 2 呈现对移民的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1 至模型 3 为单独放入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 (包括社区本地人社

会凝聚力和社区本地人非正式社会控制)变量,模型4至模型6则同时放入了移民自身的个人特征变量。

表2 对移民的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 OLS 回归结果 (N=3 35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社区本地人:						
集体效能感	-0.480*** (0.117)			0.196* (0.105)		
社会凝聚力		-0.624*** (0.108)			0.126 (0.099)	
非正式社会控制			-0.137 (0.089)			0.144* (0.077)
移民:						
业主身份 (是=1)				0.698*** (0.081)	0.696*** (0.081)	0.692*** (0.080)
上海户口 (是=1)				1.775*** (0.092)	1.780*** (0.092)	1.777*** (0.092)
受教育年限				0.029*** (0.009)	0.028*** (0.009)	0.028*** (0.009)
就业 (在职=1)				0.129 (0.085)	0.131 (0.085)	0.129 (0.085)
年龄				0.011*** (0.003)	0.011*** (0.003)	0.011*** (0.003)
性别 (男=1)				0.026 (0.060)	0.024 (0.060)	0.028 (0.060)
婚姻 (在婚=1)				-0.157** (0.078)	-0.153* (0.078)	-0.154** (0.078)
社区居住时长 (不超过1年=1)				-0.234*** (0.066)	-0.234*** (0.066)	-0.234*** (0.066)
常数项	4.820*** (0.424)	5.326*** (0.391)	3.579*** (0.326)	1.090** (0.460)	1.364*** (0.440)	1.299*** (0.362)
R ²	0.005	0.010	0.001	0.290	0.290	0.290

注: 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

表2模型1结果显示,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越高,该社区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感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假设1b,也即社区本地

人的集体效能感将对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入产生消极影响。模型 2 和模型 3 区分了集体效能感中的社会凝聚力和非正式社会控制两个概念,发现仅有模型 2 中社区本地人社会凝聚力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而社区本地人非正式社会控制变量的系数为负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 1 至模型 3 的结果表明,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越高,特别是社区本地人的凝聚力越强,则会形成本地人的抱团效应,树立本外地人之间的群体屏障,从而不利于移民在城市社会的融入。

表 2 中模型 4 至模型 6 增加了移民个人特征变量。模型 4 结果显示,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变量系数转为正且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同时模型 6 中社区本地人非正式控制变量也同样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控制了移民个人变量之后,移民所居住社区的本地人集体效能感越高,移民的身份认同程度也越高。本地人集体效能感的作用从负向作用转为了正向促进,似乎假设 1b 相去甚远,更倾向于假设 1a,也即居住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越高,本地人更能吸纳移民融入社区,从而使移民在城市社会的融入水平越高。正是这种作用转换,使得我们关注到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对移民的影响并非是稳定一致的,而是随着移民个人身份的变化而作用相异。下文将进一步探究具体是移民的哪些因素与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产生交互影响。

表 2 模型 4 至模型 6 的移民个人特征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业主身份对移民的身份认同程度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是社区业主的移民比非社区业主的移民在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上高 0.69 左右 ($p<0.01$),即相较于非社区业主的移民来说,在居

住社区拥有业主身份的移民具有更高的上海人身份认同。从户籍身份来看,移民拥有本地户籍极大地增强了其本地身份认同感,拥有上海户口的移民比未有户口的移民本地身份认同分数要显著偏高 1.775 ($p<0.01$)。

(二) 本地居民社区集体效能感与移民业主身份的交互影响

表 3 着重讨论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对移民本地身份认同影响的异质性,在 3 个模型中均加入了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与移民业主身份的交互项。

表 3 模型 1 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和移民业主身份交互项显著为正 ($p<0.1$),虽然两个主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对移民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随着移民的业主身份而变化,对于那些具有业主身份的移民,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越高,越有利于移民提升自身的本地身份认同。模型 2 中,社区本地人社会凝聚力与移民的业主身份交互项显著为正 ($p<0.05$),也即社区内本地人的社会凝聚力越强,越能够促使具有业主身份的移民认同本地身份。但是,模型 3 中两个变量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3 的回归结果整体上表明,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在社区业主和非社区业主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对社区业主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 2 得到部分验证,也即居住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会促进具有社区业主身份移民的社会融入,而对非业主移民的社会融入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 3 对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程度 OLS 回归结果：
业主身份调节作用 (N=3 35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社区本地人：			
集体效能感	0.080 (0.121)		
社会凝聚力		0.008 (0.110)	
非正式社会控制			0.088 (0.090)
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 * 移民业主身份	0.442* (0.230)		
社区本地人社会凝聚力 * 移民业主身份		0.564** (0.233)	
社区本地人非正式社会控制 * 移民业主身份			0.205 (0.170)
移民：			
业主身份（是=1）	-0.878 (0.825)	-1.292 (0.825)	-0.048 (0.618)
上海户口（是=1）	1.758*** (0.092)	1.762*** (0.092)	1.768*** (0.092)
受教育年限	0.030*** (0.009)	0.029*** (0.009)	0.028*** (0.009)
就业（在职=1）	0.129 (0.085)	0.128 (0.085)	0.130 (0.085)
年龄	0.011*** (0.003)	0.011*** (0.003)	0.011*** (0.003)
性别（男=1）	0.033 (0.060)	0.032 (0.060)	0.031 (0.060)
婚姻（在婚=1）	-0.147* (0.078)	-0.138* (0.078)	-0.151* (0.078)
社区居住时长 （不超过 1 年=1）	-0.236*** (0.066)	-0.233*** (0.066)	-0.235*** (0.066)
常数项	1.491*** (0.505)	1.764*** (0.469)	1.490*** (0.395)
R ²	0.291	0.291	0.290

注：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p<0.1, **p<0.05, ***p<0.01。

(三) 社区本地居民社区集体效能感与移民户籍身份的交互影响

表 4 呈现的是社区本地居民社区集体效能感与移民户籍身份的对移民本地身份认同的交互影响。

**表 4 对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程度 OLS 回归结果：
户籍身份调节作用 (N=3 35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社区本地人：			
集体效能感	0.108 (0.113)		
社会凝聚力		0.045 (0.105)	
非正式社会控制			0.098 (0.083)
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 * 移民业主身份	0.613** (0.287)		
社区本地人社会凝聚力 * 移民业主身份		0.633** (0.280)	
社区本地人非正式社会控制 * 移民业主身份			0.307 (0.211)
移民：			
上海户口 (是=1)	-0.406 (1.027)	-0.443 (0.989)	0.673 (0.766)
业主身份 (是=1)	0.684*** (0.081)	0.680*** (0.081)	0.686*** (0.081)
受教育年限	0.030*** (0.009)	0.029*** (0.009)	0.028*** (0.009)
就业 (在职=1)	0.128 (0.085)	0.131 (0.085)	0.128 (0.085)
年龄	0.011*** (0.003)	0.011*** (0.003)	0.011*** (0.003)
性别 (男=1)	0.031 (0.060)	0.031 (0.060)	0.030 (0.060)
婚姻 (在婚=1)	-0.154** (0.078)	-0.149* (0.078)	-0.153** (0.078)

(续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社区居住时长 (不超过 1 年 =1)	-0.235*** (0.066)	-0.235*** (0.066)	-0.233*** (0.066)
常数项	1.401*** (0.482)	1.636*** (0.456)	1.470*** (0.380)
R ²	0.291	0.291	0.290

注：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

表 4 模型 1 呈现的是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和移民户籍身份对移民本地身份认同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两个变量的主效应不显著，但是交互效应显著为正。换句话说，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将有助于促进那些具有本地户籍的移民增强其本地身份认同。模型 2 的结果同样证实，社区本地人的社会凝聚力越高，越有助于促进那些具有本地户籍的移民增强其本地身份认同。不过，模型 3 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越强，整体上不利于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但是，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对移民的影响存在着异质性，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有助于具有业主身份和具有本地户籍身份的移民增强其本地身份认同。集体效能感的两个方面——社会凝聚力和非正式社会控制所产生的影响有所差异。具体而言，社区本地人的社会凝聚力发挥着集体效能感的相似作用，但是非正式社会控制并未有显著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引入社区集体效能理论，本文使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 2017 年的住户问卷数据对影响移民社会融入的邻里效应进行了分析。

在不考虑移民自身因素时,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对移民社会融入总体上存在消极影响。这意味着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越强,特别是社会凝聚力越强,越不利于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入。但是,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的影响存在着异质性,随着移民的社会身份而产生变化,对于那些具有社区业主身份和本地户籍的移民而言,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越高,越能提升其自身的本地身份认同。也即,社区邻里效应有助于促进那些具有业主身份和户籍身份的移民融入城市社会。总而言之,以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感为代表的邻里效应对移民社会融入起到总体性排斥和选择性吸纳的作用。

美国关于种族和邻里效应的研究表明,社区主导群体的集体效能越高,更可能会对与自己族裔不同的外来移民形成排斥和抵御的作用,以维持社区内部共同体。同时,社区更倾向于吸纳与自己在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处于相同水平的移民,用来维持社区的稳定。基于上海的调查数据分析,本文发现社区本地人的集体效能感越高,对于移民的社会融入确实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但这一影响随着移民的个人特征而具有异质性。社区本地人集体效能影响社区本地人对移民的选择性吸纳,他们更倾向于吸纳具有相近财富水平的移民或具有相同制度身份的移民,来维持社区内部的共同体。

本文将社区层面的影响重新置于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在移民社会融入中引入邻里效应分析,对国内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具有一定的拓展性贡献。起初,进城移民更偏向于经济型移民,进入迁入地社会之后,主要的目的是赚钱回家。现在,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移民进入了新的阶段,移民对在城市中安家、融入城市社会有着更高的需求。在

这一情形下，移民如何与城市本地居民互动交往变得十分重要。本研究表明，居住社区中本地人的态度将制约移民的社会融入。已往研究主要着眼于移民个体，着重分析移民自身特征如何影响其社会融入，而较少去关注城市本地人对移民的态度。将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置于社区层次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关注社区层面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互动交往，是今后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参考文献

- 蔡禾、张蕴洁 . (2017). 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整合——基于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分析 . *社会科学战线*, 3, 182-193.
- 陈伟、吴晓刚、许多多 . (2023). 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了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入吗? ——来自上海的经验证据 . *城市与社会学刊*, 1, 86-107.
- 褚荣伟、熊易寒、邹怡 . (2014).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 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 *社会*, 4, 25-48.
- 崔岩 . (2012).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 *社会学研究*, 5, 141-160.
- 方长春 . (2020). 中国城市移民的住房——基于社会排斥的视角 . *社会学研究*, 4, 58-80.
- 景晓芬 . (2018). 居住空间模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 *城市问题*, 6, 80-87.
- 康传坤、李静涵 . (2022). 工作稳定性与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 . *社会发展研究*, 3, 143-161.
- 康岚 . (2015). 新“土客”关系中的外群印象与差异化接纳——兼谈完善居住证积分制的民意基础 . *城市发展研究*, 1, 116-122.
- 康岚 . (2017). “谁是外地人”: 大都市居民的地域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以上海为例 .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58-67.
- 李骏 . (2021). 从收入到资产: 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及其变迁——以 1991-2013 年的上海为例 . *社会学研究*, 3, 114-136.
- 李骏、徐美丽、张卓妮、古佩玮 . (2021). 年轻人对移民更友好吗? 对香港和上海的“世代—双城”比较 . *社会*, 5, 31-55.
- 李培林、田丰 . (2012).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 *社会*, 5, 1-24.
- 李强 . (2003).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 *中国社会科学*, 1, 125-136.

- 李强、何龙斌. (2016). 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影响研究——兼论就业的中介作用. *湖南社会科学*, 5, 147-151.
- 李兴华、蔡万焕、陈明. (2017). 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邻避效应：基于城市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察视角. *当代财经*, 5, 3-13.
- 李煜. (2017). 利益威胁、文化排斥与受挫怨恨——新“土客”关系下的移民排斥. *学海*, 2, 83-92.
- 李煜、康岚. (2016). 个体化赋权：特大城市中新“土客”关系的调适路径. *江苏社会科学*, 2, 108-115.
- 刘建娥. (2010). 乡 - 城移民社会融入的实践策略研究——社区融入的视角. *社会*, 1, 127-151.
- 刘启超. (2022). 聚居选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 *城市问题*, 6, 66-76.
- 刘雨婷. (2021). 隐晦区分：大都市本地居民地域身份认同的重构. *社会发展研究*, 2, 222-241.
- 刘祖云、彭灵灵. (2019). 社区社会组织与非户籍常住人口的社会融入——基于 Z 市 S 社区的个案研究.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2, 68-78.
- 柳建坤、许弘智. (2019). 利益威胁、政府工作满意度与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基于 CSS2011 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 2, 133-159.
- 陆万军、赵晶晶、李放. (2020). 住房属性、居住区位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 *兰州学刊*, 9, 69-83.
- 罗伯特·J. 桑普森. (2018). 伟大的美国城市：芝加哥和持久的邻里效应（陈广渝、梁玉成，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罗力群. (2000). 对美欧学者关于邻里效应研究的述评. *社会*, 4, 123-135.
- 潘泽泉、何倩. (2017). 居住空间、社会交往和主观地位认知：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湖南社会科学*, 1, 80-87.

- 戚迪明、江金启、张广胜. (2016). 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影响其城市融入吗?——以邻里效应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考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4, 141-148.
- 孙秀林等. (2018). 上海都市社会脉动: *上海调查 (2017)*.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汪毅. (2013). 欧美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及政策响应. *城市问题*, 5, 84-89.
- 王春超、张呈磊. (2017).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 *社会学研究*, 2, 199-224.
- 王桂新、武俊奎. (2011). 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社会学研究*, 2, 28-47.
- 王毅杰、赵晓敏. (2020). 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基于2010年和2017年的比较.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 117-126.
- 威尔逊. (2007). *真正的穷人: 内城区、阶层和公共政策* (成伯清、鲍磊、张戎凡,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夏伦、沈寒蕾. (2022). 流动人口真的融入社会了吗?——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 *人口与发展*, 2, 138-151.
- 徐延辉、史敏. (2020). 社区公民身份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基于厦门、苏州、东莞、深圳等地的调查. *社会建设*, 1, 34-43.
- 杨菊华. (2015).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 61-79.
- 杨菊华. (2017).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4, 119-128.
- 曾东林、吴晓刚、陈伟. (2021). 移民的空间聚集与群体社会距离: 来自上海的证据. *社会*, 5, 56-79.
- 张开志、高正斌、张莉娜、成前. (2020). “候鸟式”流动亦或“永久”

迁移?——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与人口流迁选择.
经济与管理研究, 7, 112-133.

张文宏、雷开春. (2008).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 社会学研究

Friedrichs, J., George, G., & Sako, M. (2003). Neighbourhood effects on social opportunities: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research and policy context. *Housing Studies*, 18(6), 797-806.

Hainmueller, J., & Hopkins, D. J. (2015). The hidden American immigration consensus: A conjoint analysis of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3), 529-548.

Jiang, S., Land, K. C., & Wang, J. (2013). Social ties,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perceived neighborhood property crime in Guangzhou, China. *Asian Criminology*, 8(3), 207-223.

Miao, J., Wu, X., & Sun, X. (2019). Neighborhood, social cohesion, and the elderly's depression in Shanghai.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29, 134-143.

Sampson, R. J., Raudenbush, S. W., & Earls, F. (1997).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277(5328), 918-924.

Sampson, R., & Wikström, P. (2008). The social order of violence in Chicago and Stockholm neighborhoods: A comparative inquiry. In S. Kalyvas, I. Shapiro, & T. Masoud (Eds.), *Order, conflict, and violence* (pp. 97-11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mpson, R., Morenoff, J., & Gannon-Rowley, T. (2002). Assessing “neighborhood effects” : Social processes and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1), 443-478.

Scheve, K. F., & Slaughter, M. J. (2001). Labor market competition and individual preferences over immigration polic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3(1), 133-145.

Wacquant, L. J. D. (1993). Urban outcasts: Stigma and division in the Black American ghetto and the French urban periph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3), 366-383.